
“佶城”艺术世界建构与现代转型下 湘西市民生活写真

吴正锋¹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03)

【摘要】: 田耳在当代文学中别有新意地建构起一座“佶城”艺术世界,真实勾画了现代转型下湘西社会的历史变迁,真切表现了普通市民凡庸琐碎的原生态生活图景及其精神面貌,是当代中国小城镇现代发展变迁的一面镜子和市民生活的写真图。田耳执着于故事的讲述与人物的精神分析,在其贴近市民阶层的叙事立场的背后不乏深切的人文关怀及精英意识,从而使其小说具有引人深思的思想力度和丰厚的人性深度,显示出多维的艺术趋向和深远的艺术境界。

【关键词】: 田耳 佶城 现代转型 市民生活 精神分析

在当代文坛上,田耳是一个值得关注但却被不少评论家忽视的一位青年作家。田耳像他的前辈沈从文那样,不断书写湘西那块热土,但是两人构筑的艺术世界却具有巨大的区别,如果说沈从文执着于展示充满古典色彩与牧歌气息的湘西农村生活,构筑的是充满人性美的边城艺术世界;那么,田耳则全面展示在现代转型下湘西城镇的历史变迁以及普通市民凡庸琐碎的现实生活图景及其精神面貌,全面建构起独特的“佶城”艺术世界。田耳以他的“佶城”艺术世界为中心,折射出 20 世纪末期至 21 世纪初期整个中国小城镇社会生活的变迁,集中展示了城镇各阶层,特别是市民阶层社会地位的升降浮沉及其人生哀乐,为我们勾画了一幅现代化进程中普通民众原生态的生活图景。田耳的创作不仅是一部湘西城镇社会生活的地方志、风俗画,也是当代中国小城镇在现代化进程中发展变迁的一面镜子。

一 佶城社会现代变迁的一面镜子

在田耳几十部小说中,绝大多数作品都是以佶城作为故事发生地,为此,我们称田耳的创作为“佶城”系列小说。佶城既是一个特指的地理概念,也是一个独特的文化概念。在田耳“佶城”系列小说中,每一篇小说既是一个独立的故事,又是整个“佶城”艺术世界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有的小说故事之间还具有一些关联,譬如一些相同的人名与地名在不同小说中反复出现,这种构建小说的艺术手法,颇使人想起美国杰出的小说家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的艺术世界。

佶城虽说是虚构的,但是它却具有较为明显的现实依据,我们通过对田耳的一系列小说进行考察,可以发现佶城主要是以田耳家乡湘西凤凰县城(有时扩展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首府吉首市)为依据加以虚构的地方。譬如《夏天糖》中写肖桂琴承包建筑工程,“甚至还包括修长城——不是指打麻将,正儿八经地修长城。不是孟姜女哭垮过的那道长城,那道长城轮不着她修,她年岁也不够。她修过的这道长城在我们佶城境内。”^[1]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田耳的家乡湘西凤凰为了发展旅游事业,重新修复南方长城。由此可见,这里的佶城很明显是以湘西凤凰为依据加以虚构的地方。

¹作者简介:吴正锋,男,博士,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湖南少数民族文学与湘楚文化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8XXB03)。

又如,《身边的江湖》写道:“佤城是旅游城市,一到黄金周,所有的酒店就好几倍地飙涨房价,沿江的水景房甚至涨到一千多一个标间。”⁽²⁾这里所写的显然指的是黄金周凤凰县旅游情况。作者对于拓州小说则作了如此的描写:“拓州下辖的八个县”,这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首府吉首市(乾州)很相似,因为湘西州也有八个县。湘西其他县城也在小说中得到体现。在《天体悬浮》中有这样的话:“郎山是佤城地区最北的一个县份。”⁽³⁾《重叠影像》(《人民文学》2005年第12期)中则对郎山作了这样的描写:“在云贵高原的延伸部,朗山算得是个较大的县份,六十几万人,城区就有十多万”⁽⁴⁾。这些对于朗山的描写与湘西州龙山县的地理位置和人口数量相吻合。

值得注意的是,在《天体悬浮》中,佤城则是湘西地区的指称,小说中的佤大便可以理解为吉首大学,简称为吉大。其实,湘西凤凰与吉首两者之间相距不过几十公里的路程,这里是田耳青年时期主要生活和学习的地点,田耳对佤城社会生活的描写主要是以湘西凤凰和吉首为依据的湘西地区。在田耳小说中还经常出现“广林县”,它是以湘西州凤凰县的邻县——怀化市的麻阳县为现实依据加以虚构的地名,“广林”两个字合并成一个字便是麻阳的“麻”。

1988年,麻阳县改为苗族自治县,这在《夏天糖》中也有记述:“1988年广林县改为苗族自治县,凡广林出生的人都可改为苗族。”⁽⁵⁾《长寿碑》中写佤城的邻县沱城为申报长寿之乡奔波,而现实中的麻阳县与凤凰县相邻,而且麻阳县被评为长寿之乡,这不能不说小说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和针对性。而《一个人张灯结彩》小说故事发生在钢城,但是从作品提到钢城周围的朗山(指的是湘西龙山县)、沱城以及钢城市区的狭长地形来看,钢城具有较为鲜明的湘西吉首市的特征,故这里也可以仍然将其作为佤城系列作品来看。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佤城除了特指的地理区位之外,它同时也是一个文化概念。也就是说,佤城不仅仅只是作为小说故事发生的处所,而且具有佤城地区(湘西地区)独特的社会文化特征,表现出独特的文化内涵。因为佤城地处湘鄂渝黔四省市交界地区,往往带来一种天高皇帝远的边地社会文化特征,正如《夏天糖》一句广告所说,来到佤城一切好办,表现出佤城的社会文化生活相较于外部世界具有更多的自主性和自由性的特点。

“佤城”系列小说生动地展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佤城地区(湘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及人们精神意识的变迁。

改革开放之后,偏僻的佤城地区与外部世界发生着越来越紧密的联系,人们的生活出现了现代形式的转变。“佤城”系列小说中出现了闪婚、网恋、裸体摄影、娱乐城、度假村、俱乐部等,这些都表明佤城并不是与外界隔绝之地,相反它的发展变化甚至跟国际“接轨”。《天体悬浮》中何冲经办的小吃店,主厨的大师傅是从缅甸请来的,所需的海鲜是通过空运而到达的。《风蚀地带》中老石的斗鸡是从越南购得的。

特别是佤城对外开放旅游之后,外面的人流和信息源源不断地涌入此地,极大地开阔了佤城人的眼界,也极大地改变着佤城的社会风貌。田耳不少的作品都写了佤城地区的旅游发展。《夏天糖》中黎照里在鹭庄办乡村旅游,进行价格欺诈。《到峡谷去》写各个村庄都发展旅游业,丁小唐、丁小宋两兄弟不惜在旅游过程中进行欺诈,而他们的母亲却依然保留着十分热情淳朴的传统品德。《韩先让的村庄》中韩先让率先承包了村子搞旅游,增加了收入,这不仅改变了韩先让的经济地位,也使他在村民心目中的位置得到了提高,村民不再叫他苞吊而改称他为韩老板,就连韩先让的父亲韩光的精神状态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韩光一听说儿子把村子承包了下来,气色和以前大有不同,此后见到村长村支书,以及杨大民等一干退居二线的老领导,不再耷着脑袋走路,打起招呼来,偶尔也敢直呼人家名字。”⁽¹⁾小说生动演绎了佤城鹭庄旅游如何起步、发展以及衰落的完整过程以及人们精神面貌的改变。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财富越来越成为佤城市民人生追求的价值目标之一。《夏天糖》中肖桂琴先是半边户进城,后来在供销社剥蛇,再后来来到沿海地区进口盗版录像带进行出租,发展到承包建筑工程,之后又将钱放在集资人手中获取高额的利息,最后集资的资金链断裂,表现了佤城社会的历史变迁及其人生命运的改变。《天体悬浮》中的春姐开始是一名做肉皮生意的小姐,后来开了一家专卖性保健品的商店,再后来成了一家娱乐城的老板,并因集资案而锒铛入狱。肖桂琴、春姐的人生经历折射出改革开放

以来中国部分小城市社会发展的变迁及其存在的一些问题。

田耳在其佾城艺术世界中如实地反映了由于财富的改变引起人们婚恋观念的改变。肖桂琴因为没有文化,被自己当教师的丈夫顾丰年瞧不起,但她进城后凭着对社会世俗的理解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生活很快有了起色,她不仅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收入,而且开始像城市人一样化起妆来,像城市人一样说话,在孩子面前“自称‘妈妈’了,小时候反而不这样。”⁽²⁾这使顾丰年心理严重失衡,特别是顾丰年无法接受老婆的收入超过自己,他认为她是投机倒把,最终两人因生活分歧过大而选择离婚。

人们的经济地位的改变影响其婚恋观的变化,这在《天体悬浮》中也得到表现。在派出所开车的光哥之所以离婚而跟做过妓女的春姐结婚,不仅仅是因为春姐漂亮,更在于春姐有钱,他离不开春姐。《环线车》则描写了森诚地产的老总束心蓉与丈夫梁有富之间的关系,梁有富之所以跟束心蓉结婚就是因为:“束心蓉很能赚钱,拿出去给梁有富用,梁有富一来二去有些离不开她。”⁽³⁾但是梁有富打心底却不爱束心蓉,哪怕做爱也是敷衍的。可见爱情并不是仅有金钱就能得到的,束心蓉去束缚丈夫的行为并不容易,最终梁有富还是与别的女人走了。

总之,“佾城”系列小说具有独特的地理与文化内涵,它展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湘西(佾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和人们精神意识的变迁,它是湘西(佾城)社会现代变迁的一面镜子。

二 小城镇普通民众凡庸生活的写真图

田耳小说生动地展现了当下不大被人关注的小城镇普通民众平凡、琐碎、庸常的生命样态,真实地描绘出其毫无诗意的人生哀乐形式,为当代文坛贡献了一幅生动的当代小城镇普通民众凡庸生活的写真图。

这种凡庸生活首先表现在当下一些青年琐碎、游戏,充满铜臭味的爱恋生活和生命形态。《在少女身边》讲述小丁与几个女大学生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编辑部的灰色生活,姑娘们游戏青春,在花费成功男士(她们称之为“钱包”)的金钱的同时自己也被消费。小说中小丁不仅亲眼目睹青春少女走向难以摆脱的悲剧,感受没有金钱支撑的爱情的虚幻,终于自己也成了女大学生心目中的“钱包”而收获爱情,“小丁熟知了社会中真正有效的内在法则时,便已别无选择”⁽⁴⁾,揭示金钱法则对某些人恋爱婚姻所起的支配地位。

同样,《寻找采芹》(《红豆》2009年第9期)也是这方面的主题,采芹想摆脱与廖老板的婚外情关系而过上正常人婚恋生活,但是她的男朋友李叔生却在廖老板10万元的诱惑下,重新将采芹推向了廖老板身边去。受过较好教育的某些大学生的情爱生活同样是琐碎、凡庸的,他们以游戏态度对待爱情与人生。《天体悬浮》中沈颂芬、小末两位在读女大学生分别与协警丁一腾、符启明发生情爱关系,在外住宾馆,租房子,闪婚,她们将人生和爱情当作儿戏。《友情客串》(《人民文学》2010年第5期)故事讲述在省城工作的苏小颖因失恋而来到佾城,向自己中学时的闺蜜葛双寻求精神上的安慰,但是葛双已经成为操肉皮生意的红尘女子,她借机在苏小颖醉酒之后,企图让豺狗子与苏小颖发生关系。

但是,平时参与黄赌毒事件的豺狗子却狠狠抽打葛双的脸面,他对葛双背叛自己好友的行为感到气愤,体现了他的人性之光。情感没有寄托的苏小颖最后却与陪伴自己几天的网友发生关系。故事对当下某些普通青年的情爱生活作了如实的描绘,他们身上所具有的琐屑、平凡、卑鄙乃至人性的闪光都得到体现。现代化进程中某些老年人的情爱生活也得到真实的表现。在田耳笔下,老人们也有爱的纠结,人与人的争斗与倾轧。《夏天糖》中顾丰年与沈阿姨、曾阿姨的谈爱,传统型的沈阿姨被现代开放型的曾阿姨战败,但是曾阿姨却又通过网络别有所恋而将顾丰年抛弃。《漂亮老头》(《满族文学》2010年第5期)中漂亮老头严老七与打工女青年发生爱恋纠缠。在现代社会这些老年人的婚恋纠缠都具有现代的新的特征。《朱易》和《被猜死的人》等小说则描写了老年人在养老院的普通生活,这里并不是一块净土,这里有老人们之间的爱恋争斗,对金钱的争夺,以及对死亡的恐惧,展现了普通人在离世前的凡庸卑琐的生活。

其二，佻城中等阶层的生活也充满了平庸、琐碎以及压抑不住的沉闷，田耳对此作了如实的书写。《界镇》（《中国作家》2007年第1期）和《湿生活》这两篇小说真实地反映了某些乡村教师的生存状况，是中国偏僻乡村教师生活的真实写照。一位18岁的青年女教师刚参加工作就分到一个偏僻的界镇教书，面对的不仅仅是教育条件的落后，师资的匮乏，顽劣学生的捣蛋，更重要的还在于乡村生活的单调与孤独，情感的无所寄托，以及社会恶势力的威胁与恐吓。

《湿生活》则重点描写了三位乡村教师的人生哀乐。胡胖工资菲薄而且常常不能按时领取，三十多岁才娶了一位乡村姑娘皎皎（当年自己的学生），他住的是破蔽的宿舍楼，这导致他与皎皎室内私生活被调皮的学生偷窥，他由此而踢伤学生遭受麻烦。于江则到处赌博，并因为其长得帅气而到处沾花惹草，学校教学秩序并由此受到骚扰，他最后落得被学校开除的下场。姚志则为自己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不能被推荐进好的学校而失落，最后调离此地。三个人三种人生形态，较为立体地展现乡村教师的“湿生活”。某些普通警察的生活也得到真实的表现。

《风蚀地带》警员小夏（夏谦），《重叠影像》中的二陈，《一个人张灯结彩》中的老黄，乃至《天体悬浮》中的协警丁一腾、符启明等，这些警察在破案的过程中都表现了机智、敏锐、聪颖，善于从蛛丝马迹中寻找出案件的线索，具有福尔摩斯似的探案能力，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些警察又显得极其普通而平凡，表现的是一个普通人的生命形式。譬如夏谦的爱被同事所夺，二陈被一个刚刚离开校门的女大学生大胆出格的爱的追求差点弄出事故来，老黄则是一位离婚的老警察，他在生活中和工作中总有一种排遣不掉的孤独感，丁一腾与符启明两名协警为一个正式的警察指标而几乎闹翻。

其三，抛出社会常轨、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的卑贱、平庸、令人同情的生活样态及其生命哀乐形式也得到真切的表现。《氮肥厂》（《文学界》2006年第4期）老苏与洪照玉两位生活中不幸的人彼此慰藉，他们借助气柜的颠簸做爱，最后两人被冲上天而失去性命。《一个人张灯结彩》中钢渣（邹官印）与哑女于心慧倾心相爱，他为了帮助于心慧解决燃眉之急，铤而走险去抢劫出租车，没有想到杀死的却是于心慧的哥哥于心亮。而于心亮却是一个下岗职工，家境困难，整个房间被隔成许多小间，“囿于生计，他家板棚后面还养着猪”^①。《长寿碑》中的龙马壮就因为要落实县里一个长寿指标而不得不忍气吞声。作者表现了这个社会底层沉默的大多数的深切同情。

其四，一些人获取金钱不择手段、毫无廉耻得到深刻反映。《铁西瓜》（《青年文学》2006年第4期）中高老板在“铁西瓜”（压缩机）里放进石头然后焊接好进行变卖，从而获取更多的价钱；《牛人》（《收获》2007年第4期）中“李牛人”为了金钱他可以失去尊严，只要给他钱，他就肯跪着唱；《拍砖手老柴》（《北京文学》2008年第5期）中老柴本是一个软弱无用的人，为了金钱他竟然铤而走险，做起了拍砖手（抢劫）行当。

《父亲的来信》（《上海文学》2008年第1期）和《鸽子血》（《文学港》2014年第2期）则撕破了温情脉脉的家庭面纱，呈现出某些家庭成员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前者讲述父亲死了，儿子不认尸，为的是能继续领取父亲的退休金，后者讲述继父让未成年的继女接客，还让她用鸽子血冒充处女血，以便获得更大的价钱。这些社会丑恶现象的发生，表现了当下一些人只看重金钱，人伦的缺失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一些人富裕起来，但是精神上却是一片荒芜，田耳对此也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狗日的狗》中廖老板因为发了财，便以金钱衡量一切，他将别人心爱的狗打死，认为“不就是几张钱”的事。柯羊（《身边的江湖》，《人民文学》2011年第5期）、毛大德（《友情客串》），这些人都是在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在经济上有所暴发，但是在精神上却充满哥们义气，在社会中喽啰一帮弟兄，自以为老大，最终却遭到社会的唾弃。更有一些人成为黑社会中的老大，进行非法集资乃至黄赌毒的经营，残害良家妇女，危害社会，譬如《天体悬浮》中的何冲和《风蚀地带》中的余天，他们走向人民的对立面，而最终受到严惩。

总之，田耳小说真实展示当下小城市各个阶层、各色人等普通、平庸、琐碎的生命哀乐，勾画了一幅幅鲜活的普通市民生活的原生态生命图景，生动描绘了他们毫无诗意的平庸生活状态，是现代小城镇普通市民生活的一幅生动的风俗画和写真图。

三 执着于人物心理的精神分析

田耳在人物描写过程中,一方面,他执着于故事的讲述;另一方面,他探究人物的内在心理,执着于人物心理的精神分析,他从心理学的视角对人物作了有深度的描绘,取得了重要的艺术成果。读者在读田耳的作品时可以感受到他受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深刻影响和对犯罪心理学的深入了解。《坐摇椅的男人》为我们生动地演绎了深层潜意识对人物行为的影响。小丁从小目睹邻居老梁成天坐在摇椅上摇来摇去,稍不顺心就对自己女儿的晓雯和他的老婆打骂不已,为此,小丁对老梁非常痛恨而对晓雯和她母亲则充满了怜悯之情。小丁大学毕业后不顾家人的反对入赘到晓雯家,老梁已经死去了,小丁坐上了老梁的那座摇椅,沉浸在迷离的梦幻之中,小丁也像当年老梁那样对待晓雯,稍不满意就拳脚相加,并像老梁那样死在同一把摇椅上。小丁对老梁的行为由痛恨到逐步的接受,表现了他对父权的从反抗到认同的过程,如果用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来看,这是小丁对父权话语系统的认同和被建构。《独舞的男孩》则是从心理创伤的视角展示人物的婚恋形式。小说讲述姚姿对各方面比小丁优秀的兵团哥不为所动,而对其貌不扬的小丁情有独钟,并为了与小丁结婚而将工作从省城调到佶城。两人结婚后在亲热的过程中,姚姿始终不让小丁碰自己的乳房。原来姚姿 11 岁时精神上留下了创伤,后来一个经常跳舞的十六七岁的男孩古马为警察所抓,而姚姿则心感愧疚,很想为古马做些什么,她之所以选择小丁,正因为小丁长得像古马。小说从精神分析的视角展示了精神创伤的形成及其疗治。在姚姿向小丁倾述这一心理创伤之后,她的心理情结终于得到释放,终于能够正常地与小丁享受性爱的快乐。《朱易》这篇小说也具有明显的心理学特征。故事讲述的是朱易利用敬老院老人们怕被他“猜死”的恐惧而获取礼品和金钱。朱易的猜测虽然看起来很灵验,但是他并没有什么超人的法术。朱易每天都去看望被他猜的人,坐在那人床头不停地安慰话,利用心理暗示的方法而促使被他猜中的人确信自己得了大病,给病人增添心理压力,将其生存的意志击垮,从而促使其早亡。应该说这篇小说的心理说的成分是很强的。作者后来以这篇小说故事情节为主干,重新发表《被猜死的人》(《芙蓉》2013 年第 6 期),不过小说主要人物由朱易改为了梁顺瞎子。《夏天糖》所具有的精神分析特征也是十分鲜明的,其主要体现在小说主人公江标身上。江标是一位奔跑于佶城与乡下的司机,他在一个山界上总是碰见一个四五岁、身穿“豆绿色”衣裳的小女孩躺在马路中间,江标总是停下车,轻轻地将小女孩放在草丛中离开。江标感受到女孩的身上有种水草的气味,然而几年之后这个女孩竟然消失了,但是关于女孩的记忆却深深地留在了江标的脑海里,甚至变成了江标的一个心理情结。后来江标结婚了,但是他的婚姻也无法改变他对小女孩身上气味的迷恋,江标由此陷入了苦苦的追寻之中。最后,江标终于找到当年那位躺在马路中间的女孩玲兰,可是她已经成为娱乐城的一位卖身的小姐。江标给玲兰钱,甚至花一万元包养她一个月,他不断引导玲兰承认她就是给了其美好记忆的那位小女孩,但是玲兰拒绝承认当年的事实,最后几经周折,玲兰终于承认了这一切。然而,江标在得到事实的真相后却将玲兰用车碾压而致其死亡。江标多方寻求解开心理情结的过程,成为了他生存的原因和依据,而一旦这一心结解开之后,江标便失去了生存的理由。这篇小说还引人注目地提到弗洛伊德和他的释梦:“‘是一个叫弗洛伊德的老头,他教我一套方法。……’弗爹爹那本关于释梦的书,我看了三篇,因为确实看着上瘾。梦是欲望的满足,这当然不言自明,对于梦的化妆、梦的凝聚还有梦的移植等成因方面的论述,我也是深信不疑”^①。

田耳的几篇关于警察破案的小说则涉及到犯罪心理学。《风蚀地带》关于魏成功等人的描写具有鲜明的犯罪心理学的特征。小说写魏成功在杀死余天后成功逃脱,多年以后又去到自己杀人的现场,其之所以如此,因为这个地方已经成为了他心中抹不掉的一个情结,小说写道:“杀人犯如果成功在逃,不管过了多少年,终会再回到自己杀人的地方,看一看瞧一瞧。这似乎是一种情结,或者更甚,是一种无法消除的心理障碍。”^②《重叠影像》也从犯罪心理学的视角对罪犯进行了描写。李慕新因为对汪红喜爱,强行与她亲吻,而汪红则将他的舌头咬断。从此李慕新心里有了阴影,使他陷入到一种疯狂的复仇过程中,他多次专门找模样像汪红一样个子矮但年轻漂亮的女人进行猥亵,并杀死了这样一个女人。可见,李慕新所形成的心理情结是他走向犯罪的重要原因。小说从心理情结的视角展示了犯罪的根源。

总之,田耳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犯罪心理学新的视角描绘和揭示具有精神变态人物的精神状况和生存状态,加深了人们对这一特殊人群的认识和了解,使其创作获得一种独特艺术价值和精神深度。

四 市民价值的叙事立场与知识精英的人文关怀

田耳小说主要采取市民叙事立场,它是市民精神价值进行叙事,尽可能贴近普通凡庸的市民,以他们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看待和处理各项事情,表现的是一个平凡的市民价值叙事取向。譬如,在《环线车》中,束总(束心蓉)的丈夫梁有富与“我”的女朋友小妍私奔了,束总却对“我”产生了真情,她最终不让“我”去帮她除掉可能会将她裸照散布在网上的王常,“你找到王常,想办法把照片弄到就行了,就让他到网上去贴吧。贴了又怎么样呢?只要你不在乎有就行。”“我需要你!”^①但是“我”却急忙赶向飞机场准备逃离,为的是“我”怀里揣有束总所给的十万元。“我”的行为方式完全是一个陷入拜金主义普通市民的行为方式,“我”并没有对束总的真情道白而有所感化,而是骂她为骚婆娘,心里感到烦躁,表现的是一个市民将金钱作为自己人生价值取舍标准的庸常态度。这种处理方式非常符合一个普通的市民精神价值,故显得非常真实,而假如写“我”受到感化,回到束总的身边,反而不具有真实性。这种艺术处理有一定合理性的。又如,《长寿碑》中故事的叙述者“我”,因为文笔好,被要求写长寿文化节的祭辞,“我”在虚荣心和友情难却的情况下,接受了任务,“我”所表现的是一个俗人的价值立场。再如,《天体悬浮》中的主角丁一腾,是一个老实忠厚的协警,他具有一种朴素坚韧的精神,一旦认定了目标,看似懒散,实则执着,历经种种艰难困苦,乃至遭到威逼利诱,他都能坚持自己的追求而毫不动摇,但是在精神气质上他也没有能摆脱哥儿们的江湖气息。在他已经掌握关键证据,本来可以置符启明于死地而让正义得到伸张之时,但是丁一腾的哥儿们的义气却使他对符启明网开一面,让他逃脱,表现了丁一腾性格上凡庸的一面。但是作者似乎又不忍心让符启明罪责得到开脱,符启明最终还是受到了惩罚。

田耳小说的叙述话语及其叙述方式也体现了其市民精神价值立场。田耳小说的叙述话语、叙述方式也是市民阶层的,充满了市民阶层独有的幽默与讽刺特征,其市民生活气息十分浓烈,在此,我们可以称为田耳式幽默与戏谑。应该说,田耳式幽默与戏谑集中了不少市民阶层的笑话与段子,表现了他对于市民阶层话语及其心理的熟悉与了解。《夏天糖》中肖桂琴是一位城里的个体户,当众给孩子喂奶,作为一名教师的顾丰年觉得自己妻子丢人现眼,肖桂琴便冲着顾丰年说:“你不要在那里装人,你吃得人家就吃不得?”这一话语将肖桂琴的粗俗、坦率与真实的个性鲜明地表现出来。《一个人张灯结彩》中雨城大酒店一妓女被抓,她现场举报某个人:“这老东西老来嫖我,我认得,我举报。……本来嘛,他左边屁股上有火钳烫的疤,像个等号。”^②这些描写具有田耳独具特色的幽默与讽刺特征,体现出的是鲜活的市民话语形态。小说还描写小说叙述主体“我”——丁一腾对爱情婚姻的看法,具有明显的市民阶层的现实性,同时又带有明显市民阶层的俗气:“我心里忽然闪过一个想法:要是能搞到这会读书的妹子当老婆,那多好!活了二十多岁,我仿佛是第一次有这种奢侈的念头。其实,有这念头时我还没看清她的模样。”^③作者的叙述话语也是普通市民的,具有现实主义描写的真实性。田耳这种市民精神价值叙事立场,应该说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新小说流派关注普通世俗生活相一致,这些小说以市民精神价值看取其生活,以市民的叙述态度来描写他们的生活样态,具有生活原生态的真实性。这种叙事立场与市民阶层的价值追求和审美取向相一致,使广大市民感到亲近,容易获得市民阶层的认同。

当然,我们还可以看见田耳小说依然具有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这便突破了其一贯的市民精神价值叙事立场,表现了田耳的人文关怀与人性思考,使其小说的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一个人张灯结彩》反映的是城市普通职工、无业游民、理发匠、警察等普通人员的生活。这些人生活虽然庸常、琐碎,但是他们一个个却并不缺少人性的关爱。理发匠于心慧自己是一个哑巴,被丈夫抛弃后,但她并不抛弃对孩子的责任,她在得知孩子病了后,将自己理发所得的钱全部送过去,还亲自照料小孩。于心慧对自己的情人和哥哥也充满了爱,她分别为他们两人各自购买了一顶在钢城最时新的帽子,她热切希望自己的情人能与自己一起过春节。这些都体现了一个残疾人所具有的内在的丰富情感和人性之美。于心慧的情人钢渣虽然是一个罪犯,但是他内在精神世界也有放光之处。他与于心慧倾心相爱,在得知于心慧急用钱后,“他很想手头有一笔钱,帮帮小于”^④,但是,钢渣只是一个流落在城市中的无业游民,为解于心慧的燃眉之急,他铤而走险去抢出租车司机而杀人。钢渣在自己遭受羁押面临死刑之际,他想到的却是未能实现与情人的约定:年三十那天晚上和她一起过。钢渣的形象使我们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那些卑贱、低下甚至犯过大罪的人的灵魂深处所具有的人性之光。钢渣杀死的人恰恰是自己的情人于心慧的哥哥于心亮,于心亮是一名普通职工,全家10个人的生活重担全落在一个人身上,迫于生活的压力,他工作之余开出租车为家里能多有个收入。于心亮甚至还想给自己的哑巴妹妹于心慧介绍给离婚的警察老黄。可以说于心亮对于家庭,对于妹妹,都充满了深厚的感情和责任。生活的重荷没有击垮他顽强的生活斗志,但是一场飞来的横祸却无端地结束了这样一个善良热情、尽责本分的人,让读者发出无尽的感慨和深切的人生思考。警察老黄同样是一个充满人性温暖的人。生活的磨炼使他外表冷漠,但他其实具有一颗善良、热情的心,他不仅对年青的警察充满了关爱之情,而且对于民众能够以诚相待,发现他们内在的精神之美,为了完成钢渣的心愿,年三十那天晚上,他买了烟花去与于心慧共同度过那个年夜。可以说,在《一个人张灯结彩》这篇小说中,这些人虽然普通、平常,甚至有些

琐碎、庸常,但在内在本质上,他们(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包括钢渣)都是十分善良的,但在各种无形的命运之手的作弄之下,他们一个个都带上了浓重的悲剧色彩,这不仅仅表现在于心亮和钢渣的悲剧结局上,也表现在于心慧和黄警察的孤独与寂寞上,体现了作者对人生的思考与对命运的追问。《一个人张灯结彩》具有极其深厚的人性之美,突破了田耳许多作品的市民价值叙事立场,大大提升了小说的思想力度和人性深度,具有耐人寻味的艺术魅力。然而,在田耳整个创作中,这样执着于人性的拷问和书写的作品并不是很多,不少作品留下了较为明显的市民庸俗气的艺术缺憾,显示了田耳创作的某种局限性,故这些关注普通市民人性美好的作品就更加显示出其重要的价值。

总之,田耳“侗城”系列小说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湘西城镇乃至部分小城镇现代化的历史发展进程和人们精神意识的变迁,关注与反映了普通市民庸常平凡的生命哀乐,立体而全面地反映了当下小城镇的社会生活,是当代小城镇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和普通市民生活的一幅写真图。田耳执着于故事的讲述与人物的精神分析,坚持贴近市民精神价值的叙事立场,但又具有知识精英意识,在其幽默戏谑的叙述背后不乏其深切的人文关怀,这使得田耳的小说能够更真切地表现市民的凡庸琐碎的原生态生活图景的同时,也具有引人深思的思想力度和人性深度,显示出多维的艺术趋向和深远的艺术境界。

注释:

- 1 田耳:《夏天糖》,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 页。
- 2 田耳:《身边的江湖》,《人民文学》2011 年第 5 期。
- 3 田耳:《天体悬浮》,《收获》2013 年第 4 期。
- 4 田耳:《重叠影像》,《人民文学》2005 年第 12 期。
- 5 田耳:《夏天糖》,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5 页。
- 6 田耳:《韩先让的村庄》,《民族文学》2011 年第 2 期。
- 7 田耳:《夏天糖》,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51 页。
- 8 田耳:《环线车》,《人民文学》2007 年第 11 期。
- 9 田耳:《〈在少女身边〉作者自白》,《小说选刊》2010 年第 9 期。
- 10 田耳:《一个人张灯结彩》,《人民文学》2006 年第 12 期。
- 11 田耳:《夏天糖》,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13-214 页。
- 12 田耳:《风蚀地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95-96 页。
- 13 田耳:《环线车》,《人民文学》2007 年第 11 期。
- 14 田耳:《一个人张灯结彩》,《人民文学》2006 年第 12 期。

15 田耳:《天体悬浮》,《收获》2013年第4期。

16 田耳:《一个人张灯结彩》,《人民文学》2006年第12期。